

绽放在废墟上的爱 ——我看《唐山大地震》

徐鸿晟

(西北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唐山大地震》以1976年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为前后两个情节节点,在“哑铃体”的结构中具体展现了一个家庭的不幸遭遇及人物的命运变化,表达了对传统伦理道德和家庭亲情的深切呼唤,同时通过对大灾难中救援行为的展示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

[关键词]《唐山大地震》;“哑铃体”结构;家庭亲情;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0-0078-02

1976年的唐山,方大强一家过着平凡普通但也幸福的生活。7月28日凌晨,大地震发生。为救孩子,方大强死了,姐姐方登和弟弟方达被同一块楼板压在两边,无论人们想救哪一个,都要放弃另一个。妻子李元妮在万般无奈中选择救弟弟方达,而头脑清醒的方登听到了母亲的抉择。没想到的是,母亲在救出方达离开后,被认为已经死去的女儿在一场大雨后奇迹般地死人堆里爬了起来,被一个解放军家庭收留。从此,母亲生活在自责、内疚的巨大痛苦中,女儿则生活在无助、孤独而冷漠的情感世界里……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后,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姐弟俩都奔赴汶川,并不约而同地加入了唐山救援队,姐弟二人相认。在救援现场,当方登看到一个被压在水泥板下的女孩的母亲为避免更多人受到伤害而不得不选择锯掉女儿的腿时,方登的心灵产生强烈的震动。救援工作结束后,姐弟一起回到唐山,母亲下跪以求得女儿的谅解,方登的灵魂再一次受到触动;当方登在陵园中自己的“坟墓”里看到崭新的书包和一摞整齐的课本后,她回到家里与母亲相拥而泣,交织着痛楚、委屈、怨恨的母女俩泪飞如雨……

有学者指出,《唐山大地震》以传统为基础,“选取了地震之后的心灵重建为剖面,讲述一对母女的救赎。23秒的地震造成的伤害,需要母女二人用32年的时间去缝补心灵的创伤,即便是后来两个人和解了,但32年的时间并无法去填平23秒留下的心灵落差。灾难的伤害是具体的,不过具体到心灵,就是无形的,选择心灵余震作为现实生活的切面,让电影有了灵魂,情感也有了支点。如此一来,现实不再停留在流动的生活面上,不再是对灾难救援过程的还原并在还原的过程中用形式的震撼来打动观众,而是随着电影中的人物,走进心灵的深度空间,观众与电影完成心与心的交流,感动在人物的情感和命运之

中”。^①影片所表达的“传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重视和强调的伦理道德和家庭亲情。《唐山大地震》即以中国人普遍认同的伦理、亲情为主线,讲述了在32年的时间中一个普通家庭中的一位母亲及两个孩子曲折坎坷的人生命运,由此折射出人间的挚爱深情。

为了表达这种爱,影片编导们在故事情节中设置了两处情感高潮点。从整体看,影片的故事结构仿佛一个“哑铃体”,跨度为32年的时间连接着开头和结尾两端的两次毁灭性地震,1976~2008年32年间相当长的“哑铃杆”承载了两端在瞬时发生的沉重震动,及其造成的漫长的心灵创伤。1976年,那个宁静夏天的傍晚,随着一声巨响,天空瞬间变为紫色,伴随着天崩地裂的是墙倒屋陷、人亡命息,那惨绝人寰的一幕真切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强烈晃动的画面最大程度地刺激着观众的内心。试想,在鲜活的生命刹那间化为乌有时,谁不会为之动容?谁还可以控制住喷涌而出的泪水?谁还能在感性冲动中顽强地坚守清醒的理性防线而进行深入的价值剖析?

然而,为能让情感的震撼力具体化为作品中的人物关系,编导们着意选择了受到地震伤害的千千万万家庭中的一个家庭——方大强一家。方大强为救孩子死了,留下妻子和两个孩子,而妻子李元妮却要面对人生中最痛苦、最艰难的情感抉择:在必须选择只能救出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她选择了救出儿子,而不得不放弃女儿。由此,一生中最大的心灵磨难、震颤便与她“结伴而行”,并背负起巨大的愧疚感和负罪感;而对于女儿方登来说,面对天灾中亲人的放弃,她幼小的心灵蒙受了巨大的阴影,她无法原谅母亲,也不再轻易相信别人,内心在仇恨与亲情中摇摆不定。这一有关爱的情感表达成为影片“哑铃体”结构中的“哑铃杆”——32年时间轴线的内核,并以此形成影片中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又一次伤害了人类,却也给天各一方的方家姐弟的重逢及家庭情感的重建提供了契机。从剧作结构看,编导们在1976~2008相隔32年的两次大地震中找到了弥补家庭亲情的结合点,这就是让姐弟从不同国度出发共同参与到汶川大地震的救援活动中。从故事叙述层面上说,参与汶川大地震救援活动与其说是表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间友谊,还不如说是通过姐弟相认为亲情重建、感情缝合寻求更为合理的故事节点,即是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在影片“哑铃体”结构的另一端支撑起母女、姐弟情感裂隙弥合的叙事空间,并由此体现出中国式家庭伦理道德的巨大感召力,让人们重新认识、反思家庭亲情的弥足宝贵,并万分珍惜家庭之爱的温馨与温暖。有人说:“《唐山大地震》——一部关于30年前那场巨大灾难的影片,看后不是令人感到绝望和无力,而是感到温暖和力量,并启发我们重新审视灾难、审视灾难中的个体及其心路历程、心灵重建;一部关注灾难中的个体家庭的影片,演绎灾难后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却能超越时空、超越灾难本身,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亲情的伟大和力量,并让我们重新审视家庭、审视亲情,以促使更多人回归家庭。”^②

应该说,1976年唐山大地震造成的不只是屋舍坍塌后的断砖残垣的废墟,尤其严重的是它造成了人们心灵世界的荒芜,家庭本该拥有的真情就在这样的废墟中消失了;然而,相隔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废墟却搭建起一个家庭成员消除误会、化解隔阂、逐走悔恨的桥梁,从而成为爱之情感重建的契机。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两次同样的自然灾害就这样巧妙地在影片中演绎成紧密关联的故事线索,使其在完成对中华民族32年变革、奋斗历程进行艺术展示的同时,也完成了对美好人间之爱的呼唤。在32年中,有母亲痛苦的自责和悔恨,有女儿压抑而冷漠的情感形态,有儿子的无奈;32年间,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折射出人类对爱的向往与追求,也表达了对人类为追求爱可能承担的巨大责任和付出,甚至是某种牺牲等人生过程的深刻反思。

从唐山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实际经历了32年的时间跨度,仅靠一部影片两个多小时的故事容量,显然会有些匆忙和仓促。但由于影片在艺术的集中、概括、提炼中准确地把握和处理了生活事件中最引人的情节要素,使

作品在表象的家庭伦理剧式的故事框架中注入了浓浓的情感,犹如在一杯白水中融入了可口、可心的带有苦涩的咖啡,从而达到了合理的结构设置和动人的情感内容的有机统一,并以悲剧式的开端和大团圆式的结局充分满足了观众的心理期待。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爱如果仅仅停留在个体、家庭层面上,《唐山大地震》也许就不会有更加感人、动人的艺术力量。其所以能够在更高层次上产生打动人心的艺术震撼力,还在于影片在展现两次巨大自然灾害造成的心灵伤痛的过程中,也表现了中华民族各成员之间相互关爱、无私奉献的具体行为,并因此显示出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勇毅顽强的精神气概。正如《唐山大地震》的编剧苏小卫所说:“影片中有废墟,也有高楼,它寓意着生活是可以重建的,横亘在心底的那道看不见的伤疤也是可以愈合的。当那些从废墟中走出来的鲜活的生命,一个个沐浴着无限的亲情和无疆的大爱时,影片传递给观众的无疑就是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万众一心、重建家园的凝聚力和不可战胜的民族精神。”^③

由家庭血缘亲情升华为众志成城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精神,是《唐山大地震》给我们以巨大心灵震撼的另一内涵。对个体之爱、家庭之爱的揭示,使影片具有了坚实牢固而又普遍的情感基础,而在贯穿着传统文化的故事叙事中对民族精神的张扬,使影片具有了在悠久历史文化熏陶下铸就的民族精神,这是建立在个体之爱、家庭之爱基础上又超越了个体、家庭之爱的更加广博的爱之情感,亦即人间大爱。这也使我们懂得,个体、家庭的更好生存是民族繁荣、发展的基础性前提,而民族的强大则是个体、家庭能够自由生存、快乐生存的决定性条件。所以,个体、家庭之爱必要上升为民族之大爱,我们才可以集体的巨大力量战胜任何困难和灾难,树立起坚强不屈的民族自信。

我们相信,在废墟中顽强生长并历经磨难后绽放的爱花朵,必会更加迷人;特别是当这一爱的花朵承载起跨越无法抹去的历史段落中的沉重记忆时,它必然也会激励一个有着久远历史、有着灿烂文化的民族在不屈不挠的奋进中创造更加美好的、理想的未来家园。

[注 释]

①沈岳:《中国灾难电影美学新品格——以电影〈唐山大地震〉为例》,《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②陈云萍:《论电影〈唐山大地震〉的多重超越》,《当代文坛》,2011

年第5期。

③苏小卫:《大爱无疆——电影〈唐山大地震〉创作感言》,《求是》,2010年第17期。